

刘泽华

刘泽华全集



中国的王权主义

刘泽华◎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

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刘泽华全集

中国的王权主义

刘泽华◎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泽华全集. 中国的王权主义 / 刘泽华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201-15224-0

I. ①刘… II. ①刘… ②南… III. ①刘泽华-文集
②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古代③帝王-权力-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C53②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93620 号

刘泽华全集·中国的王权主义

LIU ZEHUA QUANJI · ZHONGGUO DE WANGQUAN ZHUY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总 策 划 任 洁
责任编辑 金晓芸
特约编辑 韩 伟
装帧设计  明轩文化 · 王 烨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0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1935—2018)

刘泽华

河北石家庄人，中国当代史学大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首届主任、“985工程”三期建设重点项目“中国思想与社会创新基地”主任，兼任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多个专业学会理事。开创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王权主义反思学派”，亦即“刘泽华学派”，体现了当代中国学人的学术主体人格与史家风骨，在海内外史学界及政治学界享有盛誉。

代表作：

《先秦政治思想史》（1984）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1987）

《士人与社会（先秦卷）》（1988）

《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1992）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92）

《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1996）

《中国的王权主义》（2000）

《洗耳斋文稿》（2003）

《王权思想论》（2006）

《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三卷本（2008）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2014）

前言

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刘泽华全集(全十二卷)》,在众多南开师友、刘门弟子、家属及出版社领导、各位编辑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可以问世了。此套全集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持编选,一些事项需要在此说明:

一、刘泽华,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1935年2月出生,2018年5月8日病逝于美国西雅图,享年83岁。自1960年大学三年级破格留校任教后,刘先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学院执教四十余载,直至2003年退休。刘先生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中国社会史中心主任等校内外多种重要学术职务,受聘于多家高校及科研单位并担任客座教授,退休后被授予“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刘先生著作较多,理论观点自成一体,所提出的“王权支配社会”“王权主义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一种‘阴阳组合结构’”等命题和论断,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学术影响极大。

二、在几十年的教学与科研进程中,刘先生带起了一支专业素质较强的学术团队,以他的学术观点为灵魂,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脉络,找寻传统与现代政治理念间的异同,致力于剖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症结,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被誉为“王权主义学派”或“刘泽华学派”。先生可谓是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三、鉴于刘泽华先生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其论著的重要理论价值,《刘泽华全集(全十二卷)》得以入选天津市重点出版项目。为保证文集的学术水平和编纂质量,天津人民出版社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密切合作,联手打造学术精

品。经刘泽华先生生前授权,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持全集编选工作,成立了由李宪堂、张荣明、张分田教授为主的编选工作组,带领部分研究生收集初稿进行编选,之后又多次协调召开京津地区刘门弟子研讨会,对全集十二卷的顺序、各卷目录及学术年谱进行了反复讨论。天津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任洁带领团队全力投入,负责各卷编辑工作。

四、时值南开大学百年华诞,作为献礼之作的《刘泽华全集(全十二卷)》的出版引起广泛关注。全集编选工作得到各方支持,进展顺利。多位师友提供刘泽华先生文章手稿及照片。阎师母及先生的女儿刘琰、刘璐对全集的出版十分关心,就全集的编撰、封面设计提出不少建设性的意见。葛荃教授代表刘门弟子撰写了全集的序。葛荃、张荣明、李宪堂、孙晓春、季乃礼、林存阳等教授审读了各卷。何平、杨阳、林存光、邓丽兰等诸多刘门弟子,以及诸多南开史学的毕业生纷纷表达期待之情,翘首以待。

五、由于刘泽华先生的写作时间始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直至 2018 年 5 月逝世前夕,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各个时期的学术规范、报刊发表要求不尽相同,给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带来相当大的困难。此次出版,除对个别字句的误植进行订正外,基本保持发表时的原生样态,以充分体现论著的时代性,便于后人理解当代中国史学演变的路径及意义。刘泽华先生的回忆录《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于 2017 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被誉为“当代中国学人的心灵史”,此次全集出版时也将其收录进来,以体现全集的完整性,并于文末附由林存阳教授与李文昌博士所梳理的“刘泽华先生著述目录”。

六、由于印刷模糊、议题存疑等原因,刘泽华先生的个别文章未能收入。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增补出版,以补缺憾。

七、天津人民出版社《刘泽华全集(全十二卷)》编辑小组的全体编辑,对全集编辑出版工作倾情投入,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他们是责任编辑金晓芸、张璐、赵子源、霍小青、孙瑛、王小凤、康嘉瑄、韩伟,二审赵艺编审和三甲任洁编审。在此向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刘泽华先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是在南开度过的,他对南开大学、南开史学拥有一份真诚、朴素的情感,曾带头汇捐四十万元用于设立“中

国思想史奖学金”，希望中国思想史学科能后继有人。这套全集也是按照刘先生生前愿望，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持编选，这也是刘泽华先生向南开百年奉献的一份真挚祝福。

唯愿刘泽华先生在天之灵安宁！引导我们永远走在思考的路上！

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

2019年10月17日

序:刘泽华先生的学术贡献

葛 荃^①

刘泽华先生(1935—2018),河北石家庄人,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著名学者。研究领域包括先秦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先生成果丰硕,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著述等身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自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间或也有些研究成果,刘泽华先生此时即有论文面世,大都是先秦诸子及后世思想家方面的学术论文,鲜有专著问世。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得以复苏。1984年《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这是继1924年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②之后唯一的一部同名学术专著,其翔实和厚重的程度,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六十年来的知识积累和理性认知的进步。其后,1987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出版,这两部著作在学术界形成了重要影响,奠定了刘泽华先生的学术地位。

关于《先秦政治思想史》,据先生自述,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包括‘人’和‘书’)、资料最翔实的一部先秦政治思想史”。诚哉斯言!从体例来看,这部著作有三个特点。一是脱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套路,真正形成了

^① 葛荃(1953—),安徽巢湖人,系刘泽华先生首徒。曾在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任教。现为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会长。术业专攻: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

^② 该书一名《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体系。二是立论允当,均有翔实的史料依据。所谓“言必有据”,这正是先生“让史料说话”治学理念的验证。三是在理论突破方面有所尝试。《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1979至1983年。那个时段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曾经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还没有完全破除,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是需要胆识和超前意识的。刘泽华先生说:“在研究方法上我突破了用阶级理论定义政治的‘铁则’。我认为政治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1949年以后到本书出版之前所有的思想史著作,在论述人物及其思想时几乎都被戴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的帽子,而我在本书中实行了‘脱帽礼’。把帽子统统摘掉了。这在当时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谓余不信,不妨翻翻那时的著作。”刘泽华先生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论说方式,破除了教条思维的束缚,摒弃了几十年来桎梏人们头脑甚而轻车熟路的“阶级代入法”,形成了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突显学术个性的叙事方式。刘泽华先生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思维与当下的家国情怀相观照,充分展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学术感染力,具有明显的开创性,从而在学术界形成了广泛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更是一部力作。刘泽华先生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反思”传统,论题包括人性、民论、天人合一、法制、礼论、谏议思想、清官问题,等等。书中提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问题,论述了传统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问题。这些论题的视角和形成的学术判断展现出作者自由思维的敏锐与犀利,引起学界极大的关注。《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开启并奠定了刘泽华先生的研究路向,提升了先生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中王权主义理念的提出,预示着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已经形成,为其以后的研究及王权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开通了道路。

嗣后几十年,刘泽华先生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用功尤勤,出版了一卷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92)、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1996)和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2014)。这三部著作跨越二十余年,反映出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超越性进路。其中,1992年初版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于2001年出版修订本,被国家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2014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是这一学科发展近百

年来唯一的一部通史类著作。如果从 1923 年出版的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和 1924 年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算起,近百年来,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类的个人著述并不少。除了梁、谢之作,还有萧公权、萨孟武等人的二十余种,但是冠以“政治思想通史”者,唯先生一人耳。

此外,刘泽华先生还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集(全三册)》、《中国的王权主义》、《专制主义与中国社会》(合著)、《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合著)、《洗耳斋文稿》、《中华文化集粹丛书·风云篇》、《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竞争、改革、进步:战国历史反思》(合著)、《王权思想论》、《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史论》(合著)等三十多种书,并主编《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晚年出版个人回忆录《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这部著作登上了《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各大书榜,又被《中华读书报》评为 2017 年 5 月月度好书。

刘泽华先生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历史教学》《红旗》《文史哲》《南开学报》《天津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等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今晚报》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学术短文合计两百四十多篇。

另外,先生还有多部论文和著作在外文期刊或外国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由卢承贤译成韩文,首尔艺文书苑 1994 年出版;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由韩国著名学者、韩国荀子学会会长、韩国政治思想学会会长张铉根教授用功二十年(1997—2017),译成韩文,合计二百六十万字,已经于 2019 年 2 月面世。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形成热潮,计有几方重镇。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有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以中国人民大学为首。进入 21 世纪,重镇相继衰落。唯 2014 年泽华师主编的九卷本“通史”问世,彰显了他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即以皇皇巨著表明其学术追求的孜孜以求和笔耕不辍的坚守,誉为“著作等身”,实至名归。

二、开创学派

学者的成功不仅在于著述,更在于培养新人、接续文化与学术传承。刘泽

华先生于1982年初指导硕士研究生,1994年始招博士研究生,几十年培养弟子众多。其中一些弟子选择在高校或科研单位任职,在学术观点上与先生相承相通,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松散却志同道合的学术群体。刘泽华先生的学术旨趣在于反思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以批判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为要点,形成了一套学术理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在先生的感召和引领下,学术群体虽然分散在各地,但仍能坚守学术志向,传承先生衣钵,形成了李振宏先生命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①。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一“学派”的形成,并非有意为之,更非刻意求之,而是在长期的指导、引领与合作中自然形成的,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一方面,先生指导研究生的重点是精读原典和研习理论方法,主要通过讨论的方式,激发学生思考,学会做研究。另一方面,先生以指导学生习作的方式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旨在通过实际操作,激活学生的思维能力。特别是对于某些年龄偏大、入门较晚的学生更是如此。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在先生耳提面命、逐字逐句的谆谆教诲中,师生得以思想交流、情感交融。老师的学术旨趣、价值理念感染和浸润着受教者,许多学术判断和创见性论断在学生的著述中得到接续和不断阐发。兹可谓聚似一团火,散则满天星,历经有年,以刘泽华先生为中心的学术群体逐渐形成。

关于学派的名称,李振宏认为“是考虑到这个学派内部成员的学术个性、差异性问题的,而‘王权主义学派’较之‘刘泽华学派’,可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②。这一判断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据我所知,先生本人却没有完全认同。他认为,应该是“王权主义批判学派”或“王权主义反思学派”,否则容易令人产生误解,以为我们是赞同王权主义的,其实恰恰相反。

我与师门中诸位好友倒是倾向于最初的提法,以为“刘泽华学派”更为恰当。李教授关注的重点是“王权主义学派”的提法有更大的包容性。不过我以为,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墨子之后墨分为三,无论怎样分化,其学派的基本理念和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抑制人的个体主体性,长期以来的集体主义教育也使得我们的文化基因对突显个人有着天然的

^{①②} 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

恐惧和抵制。事实上,以刘泽华先生为创始人的学术群体,其成员主要是硕士生或博士生,以及部分优秀私淑弟子及学道同人。正是基于价值观的认同与长期的学术合作而相互呼应,形成了学术传承,以礼敬先生、光大师门的共识凝结了认同基础,具备了“师承性学派”的典型特征。故而冠以老师之名讳而称学派,或可开当代中国学界风气之先。

开创或形成学派,并非自家的一厢情愿,而是成就于学界共识。其规定至少有三:一是创始人创建出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及相应的知识与话语体系,具备特色鲜明的方法论;二是学术群体成员基本沿顺着相同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观而接续传承;三是学术群体不仅合作,更有学术创新,而且多有建树,发扬光大。借此而言,刘泽华先生能身体力行,堪为典范。学术群体成员长期合作,建立了全国性学术组织^①,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各有擅长与学术特色。李振宏对此论述详尽,这里不赘言。

三、知识创新

坊间探讨何为大学,谓之须有大师。能称为大师者,必然能在人类社会的知识传承方面有所创新。刘泽华先生正是这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理论架构和知识体系的创新。梁启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不过他仅仅从类型的视角解读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一是从“所表现的对象”来划分,分为“纯理”和“应用”两类;二是从“能表现之主格”来区分,分为“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的思想”。这样的概括显然过于笼统,学理性略有不足。此后,大凡涉猎中国政治思想者,纷纷做出解读。

近一个世纪以来,比较具有说服力的是徐大同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认识。他提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

^①2014年,以刘门弟子为主,发起成立中国政治学会之中国政治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即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迄今已经召开七届年会暨“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该论坛始于2012年,即筹备成立研究会,在学术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①进入21世纪,徐大同的认识进一步凝练,提出“一切政治思想无不是反映一定的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理想、政治要求,设计夺取、维护政治统治方案或为政治统治‘出谋献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②。这一认识较之80年代有所扩展,不过其核心仍然可以概括为“关于国家与法的认识”。

刘泽华先生认为,徐大同等人的说法相当深刻,抓住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可是尚有不足。“问题主要是把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他提出政治思想史除了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内容也应列入研究范围。计有政治哲学、社会模式理论、治国方略和政策、伦理道德、政治实施理论及政治权术理论等。^③三十年后,先生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进一步概括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包罗万象,有时还与其他领域的学说理论交织在一起,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包纳无遗,故在确定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时,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狭。即除了关于国家、政体、法制的理论以外,还要根据中国古代政治学说自身的特点,充分注意政治哲学、社会模式理论、关于治国方略与政策的理论、政治实施理论、政治权术与政治艺术理论、政治道德理论,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所关注的其他各种理论和其他各种门类学术理论中所包含的政治理论内容。”^④

刘泽华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提出了政治哲学等五个方面也须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这一学术判断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生态,拓宽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具有原创性,为构建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

① 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编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② 徐大同:《势尊道,又尊于道》,载于赵宝煦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③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④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

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整体性的概括是基于学科的发展逐渐展现出来的。自从20世纪初叶梁启超“常作断片的发表”^①,随着学科发展,有诸多研究者想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做整体性的把握。不过,研究者往往是通过历史分期或概括特点进行整体性的描述。如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等,莫不如此。被誉为以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人的萧公权也是这样。^②相较而言,萧公权的整体性认识是有一定的创新性的,但是基本格局没能走出前人的思路。

刘泽华先生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前人,他以“王权主义”概括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做出了整体性判断。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序言中,他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题归纳为三点: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随后,他将这三点归结为一点——王权主义。在他看来,所谓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③。他认为,“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作为现代人的研究,当然要借助现代学科的分类来审视传统思想,“但不能忽视当时的思想是一个整体,它有自己的特定的逻辑和结构,而政治思想则是其核心或主流部分,忽视这个基本事实,就很难贴近历史”^④。借此断言,“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为数不多的人主张无君论以外,都是有君论者,在维护王权和王制这一点上大体是共同的,而政治理想几乎都是王道与圣王之治”^⑤。显然,王权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陈述,而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的结构性认知。在这一结构中,君主政治权力系统是中心。与中心相关联的,一方是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另一方则是与权力中心及社会结构相应的思想观念。这里的逻辑关系

①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36年,第1页。

② 萧公权按照思想演变的趋势,划分为四个时期:草创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成熟时期。又以思想的历史背景归纳为三段:封建天下之思想、专制天下之思想、近代国家之思想。

③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④⑤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很清楚,政治思想与政治权力系统与社会结构相关联,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与作用的互动关系。

这就是说,刘泽华先生突破了以往就思想而谈思想,以分期的方式概括政治思想全局的思路。他从历史学家横亘历史长河的认知高度审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用王权主义的体系性框架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做总体性把握,梳理出思想与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与制度之间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认知路径,形成了独具学术个性的学理逻辑,实则构成了一种认知范式。

正是在王权主义总体把握的认知基础上,先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题和范畴做了梳理。诸如传统人文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宗教与政治、王权与“学”及士人、王权与圣人崇拜、革命与正统、政治理想与政治批判,以及道与王、礼与法,等等。又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这一判断极具首创性。刘泽华先生在几十年的探索、思考中,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学理逻辑,构建了充分展现其学术创新性的知识体系,终成一家之言。

二是学术观点的创新。刘泽华先生的研究新见迭出,多有首创性学术判断,这里仅举两例。

1.关于“王权支配社会”。这一观点是在传统的“权力支配经济”基础上提出的。先生坦言他受到了前人的启发:“王亚南先生的见解可谓前导。”不过他指出,王亚南是从经济入手解读政治权力与社会的关系。而“王权支配社会”与前人所论有着相当的差别。他说:“第一,我不是从经济(地主制)入手,而是直接从政治权力入手来解析历史。君主专制体制主要不是地主制为主导的经济关系的集中,而恰恰相反,社会主要是权力由上而下的支配和控制;第二,我不用‘官僚政治’这一术语,君主要实现其统治固然要使用和依靠大批官僚,但官僚不是政治的主体,而只是君主的臣子、奴仆,因此不可能有独立的‘官僚政治’及其他学者提出的‘学人政治’‘士人政治’等。君主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变态,如母后、权臣、宦官,等等,但其体制基本是一样的。”^①

“王权支配社会”的提出具有首创性,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我提出这一看

^① 刘泽华:《王权支配社会的几个基本理论》,《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8年第2期。

法不是出于灵机一动,而是多年来学术积累的概括。”正是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王权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学术判断为深入解读和诠释中国政治思想提供了政治学视角,使诸多传统论题的研究,诸如天人合一、圣人观、重民思潮等,得以走出前人的框架与格局。

2.“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刘泽华先生沿顺着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思路提出,“政治关系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权力关系,它还是一种文化关系”。他把制度、法律、军队、警察、监狱等称为政治关系中的“硬件”,将信仰、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称为政治关系中的“软件”,认为“政治文化指的就是这些‘软件’”。在这里,先生借鉴了现代政治文化理论,指出“政治文化是政治实体中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对政治行为起着指导作用”。他把这种状况称为“文化政治化”。其中“包括两层政治含义:其一,一定政治体制的形成有赖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其二,一定政治体制的存在和运行,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和改造。仅仅从制度、法律、规定、强制等范畴来谈政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结合一定的文化背景才能真正理解政治的运行和发展”^①。

政治文化化是说,一定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可以通过不断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逐渐内化成为政治共同体内成员所奉行的行为准则与政治观念。刘泽华先生从政治与文化互动关系的视角切入,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政治社会化理论,深刻剖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内在结构与关联。“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不仅具有学术创新性,而且作为政治学立论本土化的案例,充实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中国话语。

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严格而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是有区别的。一般而言,研究方法指的是研究的技术手段,如计量方法,包括田野调查、质性研究,等等。方法论是指运用某种理论作为认知、分析、论证和形成学术判断的手段。刘泽华先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喻“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他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学界称为“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先生坚定而决然地摒弃了僵化教条思维,扩展视野,提出并践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互动”方法与价

^① 刘泽华:《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值研究方法。

关于“互动”方法。刘泽华先生提出的“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方法”是其辩证思维的体现。他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大致说来,占主流的是‘二分法’。先是阶级的二分法,强调两者的对立。近年来,讲阶级性的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①。在他看来,“思想与社会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由于学科的分化,人类社会的主要领域被分割”。“为了提高研究的专门化程度,人们可以将本来浑然一体的历史现象分割给不同的学科。”为此他提出“必须以综合性的研究来还原并解读事物的整体”,概括出“互动”方法论。就是要“综合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资源、对象、思路、方法”,运用“互动”方法进行研究,“撰写更全面的思想史和社会史”。^②

为了进一步说明,泽华师举出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问题作为案例。他认为,正是学科分工细化导致的“二分法”将思想分为统治思想和民间社会意识,研究者将上层与下层、官方与民间、经典与民俗、精英与大众、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分隔开来。为此就需要运用互动方法论,“依照历史现象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确定研究对象,拓展研究视角,设计研究思路,对各种社会政治观念进行综合性解读”。“在对统治思想、经典思想、精英思想、社会思潮、民间信仰和大众心态分别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全社会普遍意识发展史做出深度分析和系统描写。”^③互动研究方法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与逻辑,可以视为辩证唯物论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这种研究方法能够突破主流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局限,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文化做出更为深刻与合理的阐释。

关于价值研究方法。刘泽华先生说:“一方面要注意学科自身的认识规律,循序渐进;另一方面还要借鉴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于是提出要把价值研究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视角,这显然是一种方法论的提炼。

①②③ 刘泽华等:《开展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互动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